

古代诗词典藏本

袁行霈题

主 编 袁行霈

副主编 刘跃进

王维诗选

王志清◆撰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古代诗词典藏本

袁行霈题

主 编 袁行霈

副主编 刘跃进

王志清 ◆ 撰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维诗选/王志清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古代诗词典藏本)

ISBN 978-7-100-10938-3

I.①王… II.①王… III.①唐诗—诗集 IV.
①I2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714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王维诗选

(古代诗词典藏本)

王志清 撰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938-3

2015年4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8 $\frac{1}{2}$

定价: 25.00 元

古代诗词典藏本

主 编 袁行霈

副主编 刘跃进

编 委 (按姓氏音序排列)

曹 旭 陈祖美 程章灿 过常宝 蒋 寅

刘 石 刘扬忠 莫砺锋 钱志熙 王兆鹏

钟振振 周洪波 左东岭

策 划 厚艳芬

走出学术象牙塔

刘跃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相比较而言，我们在普及工作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尽管各类选注本层出不穷，但精品甚少。很多学者不屑于做普及工作，认为体现不出研究水平；即便有水平的人去做，也很难得到同行认可。这样一种偏见，必须改变。

从学术发展的历史看，真正在学术史上确立地位的学者，都与其尽心致力于学术普及工作密切相关。汉代对于经典的注释、唐代对于古注的疏证以及清代乾嘉诸老对于历代经典的重新阐释，其出发点多是普及经典知识。现代学术研究又何尝不该如此？即以我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例，六十多年前刚刚筹划建立文学所的时候，最初的工作主要就是选注历代文学经典作品。近来翻阅《王伯祥日记》，里面详细记载了郑振铎、何其芳等人如何精心策划《诗经选》《史记选》《汉魏六朝诗选》《三曹诗选》《唐诗选》《宋诗选注》的工作，印象深刻。每一部书的编纂，从篇目的确定，到注释的推敲，都经过反复打磨。然后内部油印，送到国内相关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广泛征求学术界同行的意见。经过这样几个回合，才最后定稿，公开出版。这样的书，阐释经典，其本身也成为一种经典，多数印行在数

十万册以上，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而这些作者的名字和声誉，也逐渐走出学术圈，为广大读者所熟知。前辈学者的工作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我们必须对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有一种正确的认识。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说易行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学术研究真正服务于人民大众，首先就是要做好普及工作。没有普及，何来提高？但提高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更好地普及。现在，不少学者宁愿躲进象牙塔中做专精研究，也不愿意做点文化普及工作。这种观念值得商榷。毫无疑问，专精研究当然应当鼓励，给予尊重，这个社会也确实需要一批很专精的研究者，去做专业性很强的研究，尽管这种研究可能对社会现实没有直接作用，但是对我们整个文化发展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这道理不言自明。但同时，我们更需要一批人出来宣讲传统文化，让专家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地为大众所认知。学术工作者来自人民群众，学术研究的本质也要求必须关注社会、依靠群众。如果我们的学术脱离人民群众，那就成了无根之木，难免凋零枯索的命运。这道理不言而喻。

启示之二，做好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首先要求作者具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康德《逻辑学讲义·导论》说过：“学术的讲述是通俗讲述的基础。因为只有能够彻底讲述某物的

人，才能以通俗的方式讲述它。”这段话把提高与普及的关系讲得非常明白。提高在前，普及在后。普及不是随意发挥，一定是在提高基础上的普及才有价值。真正的普及工作者或者说一个好的普及工作者，必须是在他这个领域掌握了丰富知识的研究者。没有深入的研究，哪来生动的普及？王伯祥、余冠英、钱锺书等人的学术普及工作就是成功的典范。对学者而言，深入易，浅出难。浅出所以难，是对作者要求高，他必须真正读懂经典作品，才不至于把经念歪。我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验，专注于某一学术领域，遇到不懂的地方，偷懒的办法就是绕过去，而要讲给大众听，就无法藏拙。因此，做好普及工作，仅有良好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积学储宝、研阅穷照。只有这样，我们的普及工作才会更有实效，也才会更有意义。

启示之三，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其意义还不仅仅是传播文化知识，更是传递一种理念，一种理想，甚至还可以说，是在从事一项民族文化集体认同的凝聚工作。大家都认同这样的观点，即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命脉和灵魂。一个不知本来的民族，是绝对没有未来的希望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强调文化的多元性显得尤为重要。人类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物质文化可以全球化，而精神文化却有其强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文学研究工作者，有必要深入总结我们民族的传统特性和现实追求，并把这种特殊的文化基因固化为人民大众的行为准则和共同梦想。这样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将会永久地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由上述几点启示来看，商务印书馆策划出版的这套“古

代诗词典藏本”，恰逢其时，其意义自不必多说。编者的态度是认真的，他们以“阐释经典本身也要成为经典”为追求，其选家皆术有专攻，在其所选评方面具有相当的专精研究与学术影响，从而保证了选本的专业性与权威性。

正是由于每位选注者的研究领域、研究特点不同，因此“古代诗词典藏本”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强求整套丛书风格整齐划一，而允许一选本有一选本之个性特色。这里仅举数例：李山教授的《诗经选》，仿佛带领读者做了一次重回“诗经世界”的新旅——重新审读其字句、篇章，重新考订其创作年代，勾勒其礼乐背景，体味其文化意蕴，欣赏其风雅艺术，考察其歌唱方式……《王维诗选》的作者王志清教授认为，王维诗乃诗之哲学，亦可谓哲学之诗。故其选评，敏于感悟，精于赏玩；其评赏文字，巧于切入，工于辞采。《李清照诗词选》的作者陈祖美先生，在历代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贴近窥见了李清照的种种内心隐秘，从而细绎出易安的十余种“心事”——幼年失恃、党争株连、婕妤之叹，以及终生无嗣的庄姜之悲等等，提出了许多新人耳目的独到见解。

无须赘言，只这几本书的简略介绍，即已充分显示出选注者的学术个性。在大的统一的原则下，保留各个选本自己独特的面孔，这一点，近于文学所编写经典读本的传统。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就特别强调自己“注”的特色，而与其他选本略有不同。希望这种不拘一格、力避匠气的文风与学风，贯彻丛书始终，从而涌现出更多的既拥有学术品位又文采斐然，既不乏前沿理论、自出己见又深入浅出的精

品选本。

丛书付梓在即，编者希望我就上述特色发表感想，以便让更多的读者理解，这种信任让我感动。确实，好书好序，相得益彰。如果翻开一部新书，上来就是一篇乏味的序言，就好像刚出门，便遇上障碍物，诚可谓“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叫人眉蹙。顾炎武《日知录》早就告诫：“凡书有所发明，序可也；无所发明，但纪成书之岁可也。人之患在好为人序。”贸然作序，对读者可能会是一种冒犯。但我想，好书确实需要介绍，好意也要有所表达。我真诚地呼吁我们的同行，在努力攀登学术高峰的同时，不要忘记为社会尽些心力，为国家文化建设奉献我们的绵薄之力。

六十年前，文学研究所推出的经典读本，以著者自己研究为基础，广泛借鉴吸收前人成果，取得空前成就，影响至今。我们相信，商务印书馆推出的这套“古代诗词典藏本”，也一定能在学术普及工作方面推陈出新，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2014年5月30日

草于京城爱吾庐

导 言

受商务印书馆之邀，做成了这一部《王维诗选》。蓦然间，我发现自己一下子改变了许多，甚至感到走近了王维，虽然我一直以为王维是走不近的。我常对研究生们说：读过了王维，又读过李杜，然后再读其他，就会有一种“一览众山”或“曾经沧海”的感觉。顾随先生说：“欲了解唐诗、盛唐诗，当参考王维、老杜二人。几时参出二人异同，则于中国之旧诗懂过半矣^①。”此得珠之论，让我们越发感到：真应该好好来读王维。

一、为什么说“盛世读王维”？

王维是盛唐文化的特产。王维“独步于当时，染翰之后，人皆讽诵”（《册府元龟》）。作为京城诗人与贵族诗人的王维，被那个时代的上层社会尊为“天下文宗”。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样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

^① 顾随讲，叶嘉莹笔记《顾随诗词讲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0—91页。

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①”盛唐占统治地位的王公贵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自然就支配着唐诗的价值取向与审美趣味。王维属于全盛的开元、天宝，他是他那个时代的馈赠，他在他那个时代受到了最为崇高的礼遇和推崇，有一大批的王公贵族做他的“粉丝”。相对而言，李白、杜甫则是“草根诗人”。借用“草根”这个当下时髦的、反精英意识的话语，并没有亵渎的意思，意在还原历史，通过对比反衬，来强调一个盛世造就王维的事实。

盛唐之后，王维的地位开始走低。然而，王维也还是一直与地位飙升了的杜甫和李白，鼎足而三。可是，在1949—1979三十年间，王维高度降至谷底，王维研究降至冰点。王维被定性成“反现实主义的诗人”，其诗被诬为表现“贵族、地主的闲逸心情”^②的样板。在关于如何研究杜诗的问题上，著名学者叶嘉莹认为，要看到杜诗“写现实而超越现实”的特色，方可真正体会到杜甫的“更可注意的成就”^③。意谓：如果按照现实主义的路子来读现实性极强的杜诗，杜甫也只能被曲解，其诗的意义也只能被贬低。因此，在那种以“现实主义”判定诗歌优劣的“历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2页。

② 参见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③ 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中华书局，1984年，第98页。

语境”中，特别是在文学研究被充当阶级斗争工具的年代，王维及其诗被妖魔化的悲剧发生则是极其正常不过的事了。新时期以来的王维研究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我们依然不敢说庸俗社会学的干扰就已经完全被排除了，更不敢说我们的研究就已经完全挣脱了政治比附的惯性。

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似乎有着这么一个基本规律：越是社会不安定时期，诗歌的济用精神就越会被极端强化，而诗歌也就越得去担负那些主要不应是由诗歌来担负的责任。王维的意义，在于完成了中国诗歌由质实向空灵的趣味转变，使中国诗的审美从此以逸品为高，以韵味为上。闻一多先生曾经说过：“王维替中国诗定下了地道的中国诗的传统，后代的中国人对诗的观念大半以此为标准，即调理性情，静赏自然，其长处短处都在这里^①。”这是非常有意味的。也就是说，即便是在诗歌的济用精神被充分强化的历史阶段，人们对于诗歌艺术精神的需求，骨子里仍然是王维的趣味。“唯有王维的那种既有情又有景，外面干枯，而内部丰腴的五言绝句是别国的文学中再也找不出来再也作不出来的诗。它们是中国特有的意笔之画与印度哲学化孕出的骄子，它们是中国一个富于想象的老人的肖像，它们是中国文化所有而他国文化所无的特产^②。”

王维是中国文化的特产，是盛世社会的特产。“从诗歌发生的角度看，社会兴而山水文学兴，政治越是稳定，诗人的心性也越是稳定而富足，文学所反映社会的形态也就

① 郑临川《闻一多先生说唐诗》（下），《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5期。

② 朱湘《中书集·王维的诗》，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第121页。

越少激烈写实的直接性^①。”故而，我们考察研究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盛世读王维。”政治越是稳定，社会越是昌盛，经济越是繁荣，王维的读者就越多，王维的研究也就越火。

当下之我们，已经进入了读王维的时代。

二、为什么把王维诗定性为“诗的哲学”？

我们一直有这样的想法：王维的诗，是诗的哲学，是诗的哲学化，是哲学化的诗。

闻一多先生说：“中国伟大的诗人可举三位作代表，一是庄子，一是阮籍，一是陈子昂，因为他们的诗都含有深邃哲理的缘故^②。”把庄子定性为诗人，真可谓石破天惊之论。虽然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闻一多对庄子的评价，给我们的王维研究以深刻启发。庄子是以哲学来表现诗的意蕴，而王维则是以诗来表现哲学的内涵。庄子是诗人型的哲学家；王维是哲学家型的诗人。王维的诗是哲学的诗，是诗的哲学。

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几乎所有的哲人都十分关切人类自我救赎的问题。王维诗中思考与表现得最多的，就是对人生的终极关怀。王维最喜欢描写自然山水的自然状态（不管什么题材的诗中都出现景物描写），最喜欢描写落日（介于光明与黑暗之间），最喜欢描写秋天（介于夏天的热

^① 王志清《东亚三国文化语境下的王维接受》，《中国比较文学》2012年第1期。

^② 闻一多《唐诗杂论》，中华书局，2009年，第246页。

烈与冬天的肃杀之间)，他正是通过这些描写来演示或验证佛义禅理，探索宇宙人生与世态人情，表现人类所特有的超越有限而追求无限以达到永恒的一种精神渴望，寻求人类精神生活的最高寄托，以化解生存和死亡、有限和无限的尖锐对立的紧张状态。他诗中所讨论与反映的哲学命题包括：现象与本质，规律与超验，个别与一般，宏观与微观，瞬间与永恒，以及有无生灭，动静变常等等。王维十年师事道光禅师的功夫，以及嵩山、终南、辋川隐居而寻求证果的经历，让他获得了佛教禅宗的“空”观之助，使其能够比较轻易地入定凝神，真正体验到自然山水之禅机，从而生成自性、物性、佛性而融合为一的体验，实现精神上的解脱与超越而进入禅寂境界，给予人生种种实践以终极性的价值和意义根据，从而也诞生了许多既富有哲理深意而又无比优美的艺术意境。

哲学的起点便是文学的核心。读王维的诗，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其诗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都是空幻不实的，都是美不胜收的。诗人凝神于景，心入于境，心似乎消失了，只有大自然的缤纷绚烂。诗中的那些时明时灭的彩翠，合而复开的绿萍，转瞬即逝的夕阳，若隐若现的烟岚，都在契合刹那永恒这一本真之美，而让人于其中领悟到的不仅是大自然的物态天趣，而且是一种宇宙、人生、生命的哲理，是一种哲理化的禅悦状的诗性情感。古人评赏王维的诗，常用禅喻，如“字字入禅”，读后使人“名言两忘，色相俱泯”（胡应麟语）；又如“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王士禛语）；再

如“不用禅语，时得禅理”（沈德潜语）等。这些评赏，其实不是将王维的诗神秘化，更不是认为其迷幻而不可解，也不是以其诗来直接对应佛教的空幻寂灭，而是将其诗哲学化，妙悟化。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义后体认到自己的心灵深处而灿烂的发挥到哲学境界与艺术境界，静穆的观照与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二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①。”著名的美学家李泽厚也认为：“禅正是诗的哲学或哲学的诗^②。”古来以禅喻诗的思维与观点，源自司空图的“言外”“象外”与严沧浪的“镜花水月”的理论。李泽厚指出：司空图《诗品》与严沧浪《沧浪诗话》，相对于刘勰《文心雕龙》与钟嵘《诗品》来说，是“更为纯粹更为标准的美学了”^③。禅宗非常喜欢与大自然打交道，王维的诗与之同；禅宗往往出以“妙悟”思维，王维的诗亦与之同。王维以禅入诗，诗禅不辨，其所关注的已经不仅是自然人世，而是以心理本体的建设为目的，建设一种超时间的形上主体。从表面上看，王维似乎只对山水感兴趣，甚至只对禅坐佛事感兴趣，而对现实漠不关心，诗多写无心、写偶然、写无思无虑的直觉印象，多创设恬淡静适、清空幽谧的意境，而从胜义谛角度看，则参证了“凡所有相，皆是虚空”（《金刚般若经》）的禅宗要义；从哲学的层面上

①《宗白华全集》第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64页。

②《李泽厚十年集》第一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71页。

③《李泽厚十年集》第一卷，第153页。

看，即是内心深度开掘，向“空”而生，创造出一个哲学化的“空”观境界，契合也演绎了山水自然中所蕴含的禅机与哲理。

王维的出现，实现了中国诗歌由质实而空灵的美丽转身，强化了诗歌的形上性，也使中国诗学开始以意境为上。宗白华先生在谈论意境诞生时指出：“中国艺术意境的创成，既须得屈原的缠绵悱恻，又须得庄子的超旷空灵。缠绵悱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环中’。超旷空灵，才能如镜中花，水中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超以象外’。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不但是盛唐人的诗境，也是宋元人的画境^①。”王维心空则深得禅悦，兴象深微。外物湛然空明，即便是在万籁声中，他也能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声音和自己的声音。其笔下的自然界，花开草长，鸢飞鱼跃，活泼而富有生命韵味，这是审美意境，也是人生境界，是其“空”观思维所致生的心理世界。李泽厚认为：“具有禅味的诗实际上比许多禅诗更真正接近于禅^②。”他认为，王维的那些“充满禅意的作品”，“比起庄、屈来，便具有一种充满机巧的智慧美。它们以似乎顿时参悟某种奥秘，而启迪人心，并且是在普通人和普通的景物、境遇的直感中，为非常一般的风花雪月所提供、所启悟”^③。读其诗，让我们染上了一身静气，让浮躁之心获得了一种恬静的

① 《宗白华全集》第二卷，第364页。

② 《李泽厚十年集》第一卷，第368页。

③ 《李泽厚十年集》第一卷，第369页。

安顿。

王维的诗歌，在于使中国人在回归山水自然的同时，从现实山水自然而走向了形上的山水自然，其深入空寂而兴会神到的创作机缘，表面上是以自然山水之空来“空诸所有”，而本质上则是以“空”为内在精神与自然物质来表达其关于宇宙、人生及生命的哲学思考。李泽厚认为，读这样的诗需要一种“非理知思辨”的妙悟，以期进入“悦神”层次的审美愉悦。而这种“悦神”愉悦，“是感性的，并停留、徘徊在感性之中，然而同时却又超越了感性。将来或许可以从心理学对它作出科学的分析说明；现在从哲学说，它便正是由于感性的超升和理性向感性的深沉积淀所造成的对人生哲理的直接感受”^①。因此，我们读王维，对王维的这种镜花水月之空幻美的阅读，需要改变我们的阅读思维，尤其需要一种妙悟感受。

三、为什么此选本要重在技术层面上读？

曾经不止一个青年教师对我说：您能不能写一本怎么写诗的书？

也许是因为我也写点旧体诗赋，这些青年学者们也想练笔古诗赋，抑或是也想在教学与研究中从技术的层面来解读诗赋。

朱光潜先生说：“要养成纯正的文学趣味，我们最好从

^①《李泽厚十年集》第一卷，第364页。